

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

本 社 编

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

本社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4.375 插页 2 字数 643,000

1983 年 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 册

书号: 10188·814 定价: (七) 2.85 元

目 次

- 托尔斯泰和中国·····戈宝权 (1)
- 我们向托尔斯泰的遗产学习些什么·····辛未艾 (27)
- 哲学·革命·文学
- 列宁论托尔斯泰·····余绍裔 (53)
- 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陈 彝 (73)
- 二十世纪的一位殉道者
- 从托尔斯泰的出走谈起·····周敏显 (129)
- 试论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鲁效阳 (154)
- 托尔斯泰和长篇艺术的发展·····夏仲翼 (175)
- 通向现实主义高峰之路
- 托尔斯泰论真实性、客观性、主观性、真诚和分寸感
- 钱中文 (194)
- 托尔斯泰的探索主人公的典型意义·····刁绍华 (237)
- 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钱谷融 (255)
- “心灵的辩证法”
- 评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管 珑 (283)
- 浅析狄更斯与托尔斯泰的儿童心理描写
- 从大卫和尼科连卡谈起·····孔海立 (301)

- 托尔斯泰心理剧《活尸》浅论……金留春 黄成来 (318)
- 《战争与和平》的艺术成就……李明滨 (339)
- 读《安娜·卡列尼娜》……张秋华 (353)
- 《复活》中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形象……徐稚芳 (370)
- 从玛丽雅娜到玛丝洛娃
- 兼谈托尔斯泰笔下平民妇女形象的发展……章海陵 (385)
- 托尔斯泰八十一——九十年代的中篇小说……赵先捷 (404)
- 评哈吉穆拉特
- 历史人物、艺术形象和作家思想……冯玉律 (423)
- 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王金陵 (443)
- “在作家中我偏爱托尔斯泰”
- 契诃夫谈托尔斯泰……朱逸森 (461)
- 托尔斯泰否定莎士比亚问题初探……匡兴 (472)
- 俄国托尔斯泰研究简论……倪蕊琴 (495)

附录

- 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简表……倪蕊琴编 (525)
- 《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一——九十一卷
- 目录总汇……宋大图 朱春荣 章海陵译 (561)
- 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文译本及有关研究书目
- 索引……复旦大学外文系外国文学研究室编 (709)

托尔斯泰和中国

戈 宝 权

“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
中国去。”

——托尔斯泰（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七日）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黎明前，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和庄园离家出走。由于一路上饱受风寒和辛苦，终于在十一月二十日的清晨六时零五分，因肺炎和心脏衰弱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长逝。

托尔斯泰逝世的噩耗立即传遍全世界，引起各国文艺界人士的震惊，因为他的逝世，不仅是俄国文学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同时也是全世界文学的一个重大的损失！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给予托尔斯泰以很高的评价，称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且说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①在托尔斯泰逝世以后，列宁又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指出：“列甫·托尔斯泰去世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世界意义，他作为

思想家和说教者的世界名声，这两者都各自反映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②

托尔斯泰逝世的消息，当时在我国也得到了反响。如上海《神州日报》上写道：“托尔司泰（吾国旧译亦作唐斯道）伯爵之噩耗，已传遍于世界。此世界中，顿失一学界伟人……然在世人崇仰之心，终难忘情于木坏山颓之感也。”当年十二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也发表了“俄罗斯大文豪托尔司泰卒”的消息，称他为“俄之大贤人也”，并转载了《神州日报》的纪事。这些话都表示了我们中国人民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热爱与崇敬！

托尔斯泰离开我们已是整整七十周年了。当他的忌辰来的时候，许多往事萦回心头。现在我想在此谈谈我对托尔斯泰的敬仰，谈谈我在研究托尔斯泰和中国的关系、托尔斯泰的名字最初在什么时候被介绍到我国来，以及他的不朽的著作在我国流传的情况中的一些新的发现。

一

回想起来，那已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当一九二四年我刚满十一岁的时候，我的叔父戈公振送了一套六本的《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给我，那是我最初读到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印在这本书前面的托尔斯泰的画像和他给自己的孙儿与孙女讲《农夫和黄瓜》故事的照片，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等到我十六岁到

① 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页。

② 见《列·尼·托尔斯泰》，载《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1页。

上海进大学时，我读到了艾马·莫德和他的夫人用英文翻译的《二十三篇故事》，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上帝看出真情，但不立刻讲出来》和《高加索的俘虏》等故事，当时我曾把它们译成中文，印在同学编印的刊物上。接着我又读了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俄国名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杰尔纳克画的有名的插图，如卡秋莎·玛丝洛娃上法庭和受审等，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到了三十年代初，我开始学习俄语，当我最初从《识字课本》里直接读到托尔斯泰写的《狮子和老鼠》等小寓言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呀！我特别高兴的是，托尔斯泰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俄国文学的窗户；他使我热爱俄国文学，热爱俄国美丽的大自然，热爱勤劳勇敢的俄国人民。正因为这样，我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始终是非常热爱和敬仰托尔斯泰的！

一九三五年初，我作为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到了莫斯科。我首先就访问了在克鲁泡特金大街的托尔斯泰博物馆和在哈莫夫尼切斯克巷的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五十年代初，当我在莫斯科我国驻苏大使馆工作时，我住在克鲁泡特金巷，距离同托尔斯泰有关的地点都不远，因此我时常散步走到处女田野广场，坐在麦尔库罗夫雕塑的托尔斯泰的塑像旁边休息，也常到他的博物馆和故居去。

托尔斯泰的故居是他晚年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一年度过了十九个冬天的地方，也是他写成最后的不朽之作《复活》的地方。列宁在一九二〇年曾来这里参观，并指令把它改成为故居纪念馆。当我们走进故居的雕花大门时，就看见一所两层的有十多个房间的楼房。楼下有宽大的餐厅，有托尔斯泰和他的夫人的卧室以及他的子女的住房。走上楼梯，就来到一间宽敞而又明亮的大厅，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这里曾经一度

成为莫斯科文艺界人士活动的中心。在二楼最吸引人的就是托尔斯泰的工作室。从这个房间看出去，是一个很大的花园，托尔斯泰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写信告诉他的夫人：“花园是多么美丽呀：坐在向着花园的窗口——心情愉快而又平静。”^①就在这个房间里，放着一张带栏杆的写字台，上面摆着两个蜡烛台和写作用的钢笔，托尔斯泰就在这里伏案写成了长篇小说《复活》。

当我在莫斯科居留的期间，我也访问了不少与托尔斯泰的著作和人物有关的地点。就拿《战争与和平》来说吧：我曾经多次到过沃罗夫斯基街苏联作家协会的所在地，据说这里曾经是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家。我到过近郊的索科尔尼基公园，据说这里曾经是彼埃尔·别祖霍夫和道洛霍夫决斗的地方。我曾经登上现在耸立着莫斯科大学的麻雀山（现名列宁山）和附近的敬礼上，那是拿破仑入侵莫斯科时到过的地方。我们现在从山顶上可以看见被称为母亲的宏伟的莫斯科城，看见许多教堂的尖顶和闪耀着金光的克里姆林宫。我也到过菲里的库图佐夫的木屋，俄国的将领们曾在那里研究了最后如何粉碎拿破仑入侵的计划。再讲到《安娜·卡列尼娜》吧：莫斯科城中心有不少地点如饭店和俱乐部，是同小说中的人物有关的，他们在那里吃过饭和跳过舞。还有动物园的溜冰场，那是列文和吉提溜过冰的地方。我还记得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上演话剧《安娜·卡列尼娜》，当晚契诃夫的夫人、著名演员克尼佩尔·契诃娃和《安娜·卡列尼娜》一剧的导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正坐在我的前一排，丹钦科不时地转过头来亲切地问我，是否能看懂这出戏。至于艺术剧院上演的《复活》，我也曾看过多次，卡恰洛夫

^① 见《托尔斯泰全集》第 83 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28—1958 年版，第 356 页。

朗诵的台词和叶兰斯卡娅演的卡秋莎，更是令人难忘。

在我的生活中，印象最深的，那就是访问在图拉城附近的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为了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二十五周年，我应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随同苏联文化界和文艺界的人士访问了他的故乡。这里是托尔斯泰诞生的地方，是他八十二年的一生中度过了六十多年的地方，是他写成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名著的地方，是他最后离家出走的地方，也是他永远长眠的地方。用托尔斯泰夫人的话来说：这是他的“摇篮”，也是他的“坟墓”。托尔斯泰本人在一八五八年也曾这样写道：“没有雅斯纳雅·波良纳，我很难想象出俄罗斯，也很难想象出我和它的关系。”^①

托尔斯泰的庄园距离莫斯科有两百多公里，地方很广阔，一部分是森林，一部分是耕地和田野，其中有一座两层的楼房，这是他的故居。在故居门口有一株被称为“穷人树”的老榆树，托尔斯泰经常就在树荫下面接待贫苦的农民。门旁还有一个宽敞的凉台，栏杆上雕刻着鸡、小孩和马的民间图案，这是托尔斯泰全家人消夏的地方。从大门口走上二楼，首先是间明朗的大餐厅，接着就是托尔斯泰晚年工作的书房，他本人的卧室，他夫人的卧室，一切都显得非常朴素。托尔斯泰的书房的墙壁上挂着意大利名画家拉斐尔的圣母像，前有用木板制成的两层书架，上层放了一套八十多卷的俄文百科全书。写字台上放着各种文具，靠墙的一张小桌子放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在离家出走之前曾最后读过这本书，打开的地方是一四四页至一四五页，在这所房子上下的过道里，托尔斯泰收藏了二十多种语言的图书共两万三千多册。在楼上的藏

^① 见《托尔斯泰全集》，第5卷第262页。

书室里还有一个放着钢笔和墨水瓶的文具盒，那是庄园里的一个农民送给他的，上面刻着一句富有深刻含义的俄国谚语：“用笔写下来的东西，就是利斧也砍不掉。”楼下有著名的“控顶室”，这原是一间有控顶的储藏室，墙上挂着托尔斯泰用过的锯子，墙角倚着他干农活用的大镰刀。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这个房间，曾利用它作为工作室，前后有二十年之久。他这样说过：“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我一个人完全处于寂静和缄默之中。”^① 他在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八年，每天工作十多小时，用了七年的工夫完成了他的史诗般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俄国名画家列宾曾画了一幅托尔斯泰在写作的油画，使这间“控顶室”永垂不朽。就在它的近旁，还有一间客房，托尔斯泰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七年，在这个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写成了他的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我第一次访问托尔斯泰的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是在一个寒冬，到处冰天雪地，但对托尔斯泰的崇敬却温暖了我的心。这样经过了二十多年，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这个初夏的日子，我又重新访问了托尔斯泰的故乡，那天是晴空万里，游人如织，托尔斯泰的庄园美丽得风景如画，我这才第一次真正理解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含义，那是千真万确的“明媚的林间旷地”了。承博物馆负责人亚历山大·波波夫金热情接待，陪同我重游了我一度到过的那些熟悉的地方。高兴的是，我这次仔细地看了托尔斯泰晚年工作的书房，看到在他的书架上立着的两本用英文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承他们同意让我翻阅了这两本书，发现上面有托尔斯泰写的不少译文和解释。我们最后来到托尔斯泰

^① 转引自波波夫金著《雅斯纳雅·波良纳》，苏联儿童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第41页。

长眠的地方，在古老的橡树和菩提树的环绕之中，有一个盖满了丰茂的青草和蕨叶的墓，墓上没有任何碑石。据说托尔斯泰在童年常随他的三个哥哥到这处称为“老禁区”的树林里来玩。他的长兄尼古拉就告诉他，说在这里埋着一根“绿杖”，上面写着各种秘密，谁要是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全人类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托尔斯泰那时才不过五岁，他一生中都在探求这个秘密，想找到使人类得到幸福的办法。他在一九〇八年还表示，在他死后不要举行宗教的仪式，用普通的棺木把他葬在埋着“绿杖”的地方，现在他就永远长眠在这幽静的绿荫丛中了。

从那时起又过去了二十多年的岁月，但对于托尔斯泰的故居和庄园的访问，一直到今天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段最珍贵而又难忘的回忆！

二

多年来，在阅读和研究托尔斯泰的过程中，托尔斯泰和中国的关系的问题，经常吸引住我的注意。这就使我想起高尔基所讲的一段关于托尔斯泰的话：“整个世界，整个大地都在望着他；从中国，从印度，从美国——从所有的地方，一条条活生生的颤动的线向他伸了过来，他的心灵——是为了所有的人，而且——永远是那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托尔斯泰一直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热爱，他本人也非常关心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命运和文化与思想。

从大量的史料中，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在他的一生中，不仅重视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历史，钻研过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他还对

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中国人民表示过深厚的同情。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当中，恐怕很少有人象托尔斯泰这样关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了。从他的著作、书信和日记中，我们知道远在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六〇年我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法联军先后侵占我国的广州、天津等城市，放火焚毁我国的名园圆明园时；当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和镇压义和团的英勇反帝斗争时，他对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和掠夺，都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如他在一八五七年写的小说《卢塞恩》（旧译《琉森》）中就谴责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揭露了英国人在屠杀中国人民。又如他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俄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都想占据中国；争吵，外交的斗争——还将会军车上的争夺……”^①到了一九〇〇年七月他写成有名的政论文章《不准杀害》，对八国联军的烧杀掠夺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当年十月他又开始写作《致中国人民书》，但未正式发表，现仅存手稿。

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托尔斯泰的思想和生活中发生了一场“激变”。这时他同他所属的俄国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决裂，而想在耶稣基督的教义、东方的古代哲学，特别是在我国的老子和孔子等人的学说中寻找生活的真理，企图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新生活。他曾通过英、法、德等国关于论述中国的著作来研究我国的情况；通过这些文字翻译的老子和孔子的著作来研究他们的学说。据统计，他当时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译本就有三十二种之多。当一八九一年十月彼得堡的出版家列杰尔列询问他，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的影响

^① 见《托尔斯泰全集》第53卷第185页。

最深，他答复说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①。

托尔斯泰远从一八七七年就开始阅读和研究老子的著作，对老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并准备翻译《道德经》。他在一八八四年三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翻译老子，不能象我所想的翻译得那样好。”^②一八九三年九月至十月，他同波波夫一起根据德文译本翻译老子的《道德经》。一八九五年他校订了在俄国研究神学的日本人小西氏翻译的《道德经》。一九一〇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编选的《中国贤人老子语录》，封面上印有老子骑青牛的图。就在这本书里，他还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一文。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后来他就把它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主张用“无为”来对待一切事物。

从一八八四年起，托尔斯泰又开始阅读和研究孔子。他在当年二月末写给他的好友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坐在家，发烧，得了很厉害的感冒，第二天阅读孔子。”^③接着他就写成《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文。他在《论孔子的著作》一文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④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什么也没有写，专心研究孔子，感到很好。吸取精神方面的力量。很想写出我现在所理解的《大学》和《中庸》。”^⑤一九〇三年和一九一〇年，托尔斯泰还编辑了布朗热编写的《孔子·生平及其学

① 见《托尔斯泰全集》第66卷第68页。

② 同上，第49卷第64页。

③ 同上，第85卷第30页。

④ 同上，第25卷第532页。

⑤ 同上，第24卷第54页。

说》一书，并写了序文。

这时，托尔斯泰还开始研究孟子。一八八四年四月九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开始研究孟子。非常重要，非常好。”^①接着他又研究墨子，他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五日写信告诉切尔特科夫：“开始读墨子。”他非常喜欢墨子关于兼爱的思想。一九一〇年他还编辑了布朗热编写的另一本书《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

托尔斯泰常想写作关于中国哲学的论著，如他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五日写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中就说：“我重新阅读了老子，现在开始阅读理亚格的书中包括墨翟的一卷，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慧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问题的讨论……”^②据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在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一〇年将近二十多年当中，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十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在他编选的《每日贤人语录》和《阅读园地》等书中，还引用了大量的中国的格言、谚语，以及老子、孔子等人的箴言。他继续进行这一研究和编辑的工作，直到他最后逝世时为止。

托尔斯泰一生当中，曾多次想和中国人通信和接触，但直到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当他已是七十七岁到七十八岁的高龄，离开他逝世只有四年的时候，他才初次和两个中国人通信：一个是我们很少知道的张庆桐(1872—?)，另一个则是著名的学者辜鸿铭(1857—1928)。在这些信里面，托尔斯泰都表示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与尊敬。象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四日答复

① 见《托尔斯泰全集》第49卷第80页。

② 同上，第87卷第236页。理亚格(1815—1897)，英国著名汉学家，译有《四书》。

张庆桐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在我整个长远的一生中，我曾经有好几次同日本人见过面，但从没有一次同中国人见过面，也没有发生过关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所驳斥了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敬佩）。我对于中国人民经常怀有深厚的尊敬，很大的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的种种事件而更为加强了。”^① 托尔斯泰的第一个通信者张庆桐是谁呢？这个问题过去曾引起过不少论争，因此我从五十年代起曾专门研究了这个中外学者都没有能解决的疑难。我们最初是从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写的《托尔斯泰传》中知道这个名字，而罗曼·罗兰又是根据保罗·比留科夫编著的《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把它写成“Tsien Huang-tung”的。徐懋庸在翻译《托尔斯泰传》时把这个名字译成“钱玄同”；后来傅雷在重译此书时，则注为“此人不知何指”。当抗战胜利前后，曾有不少人根据这个名字的对音，写了不少文章进行研究和争论。如蒋星煜考证这是“钱玄同”，而且还引证了黎锦西的意见。经我研究，这个考证站不住，因一九〇五年钱玄同才十八岁，不大有可能同托尔斯泰通信。谭彼岸的文章中推测这可能是一八九〇年出使俄国的大臣洪钧（文卿），经我查证，洪钧早在一八九三年就已经去世。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写的《苏联纪行》中，猜测这可能是张之洞。郭老说：“这个人在国内有人认为是‘钱玄同’，钱玄同二字可说风马牛不相及。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张之洞’……以年龄和资望说来，以张之洞最为合格。此人并无回信，或许原信没

^① 见《托尔斯泰全集》第76卷第62页。

有送到也说不定。”^① 在国外的研究者当中，如比留科夫的《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并无考证；美国的研究者德克·博德在《托尔斯泰与中国》一书中猜想这可能是当时清政府驻彼得堡公使馆的工作人员；苏联出版的百年纪念版《托尔斯泰全集》中，说这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住在彼得堡的一个中国人。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五十年代初我在莫斯科时，曾从托尔斯泰博物馆得到这封原信的影印照片（这封信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初次发表在《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六卷中），先就原信进行了研究，后来又查了有关的档案史料，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是张庆桐。他于一八九九年由北京同文馆派往俄国留学，在彼得堡法政大学学习。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一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并将他同俄国东方学者沃兹涅森斯基合译的梁启超的著作《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寄去，请托尔斯泰教正。他在书的里封面上写着：“俄国伟大作家惠存，深表敬仰之意。张庆桐敬赠。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一日于彼得堡。”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厂甸的旧书肆上偶然发现了张庆桐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俄游述感》一书，张庆桐曾将托尔斯泰写给他的信译为中文，连同原信的照片刊出，并用七面的篇幅介绍了托尔斯泰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就更加证实了这一件事。张庆桐还说：“托氏手书，余珍藏之，异日当置之国家博物馆中。”后来阿英送了一本《京师同文馆学友会报告书》给我，又知道张庆桐是江苏上海人，后曾任我驻恰克图都护副使。当我把这些史料告诉郭老时，郭老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九卷中写了更正，并注明：“此人经戈宝权同志查明，系张庆桐，乃一九〇五年由同文馆派往彼得堡的留学

^① 见《沫若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76页。

生。”^① 苏联的托尔斯泰研究者希夫曼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也采用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发现。^②

至于托尔斯泰的另一个通信者辜鸿铭，曾在一九〇六年三月通过俄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勃罗江斯基把他用英文写的《尊王篇》和《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两本书送给托尔斯泰，这两本书现存在托尔斯泰庄园的藏书室里。托尔斯泰要他的秘书先复了感谢信，并请他的好友切尔特科夫把在国外出版的他的被禁的著作寄给辜鸿铭。当年九至十月间托尔斯泰写了复信，题名为《致一个中国人的信》，先后发表在德文的《新自由报》和法文的《欧罗巴邮报》上，并出版了俄文的单行本，现收在百年纪念版《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六卷中。到了一九一一年我国才有了中译，发表在当年一月号的《东方杂志》上。托尔斯泰在信的一开头就说：

“我接到你的书，我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它们，特别是《尊王篇》。

“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向非常引起我的兴趣，我曾尽力想理解中国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这主要是中国的宗教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和对他们的注疏。我也读过中国有关佛教的书籍以及欧洲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最近这个期间，在欧洲人——其中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包括俄国人——对中国人民所施加的种种暴行之后，中国人民的一般情绪，特别引起我的兴趣，而且还将会引起我的兴趣。”^③

① 见《沫若文集》第9卷第476页注①。

② 见《托尔斯泰与东方》，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页。

③ 见《托尔斯泰全集》第36卷第290页。